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1.004

政党为体,党报为用

——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党报思想述评

路鹏程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总结海外革命党党报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政党为体,党报为用”为核心,对党报的根本性质、功能作用、经营管理、宣传策略等均作出细致深入的论述,初步建构其党报思想。但揆诸实际,孙中山当时领导下的革命党,政党之“体”尚未健全,党报之“用”自然也难以最大化地发挥其效力。

[关键词] 党报原则;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政党观

[中图分类号] G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7)01-0019-06

**“Revolutionary Party is the Body, while Party Newspaper is the Tool”:
Review on Sun Yat-sen’s Thoughts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Newspaper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U Pengche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overseas Revolutionary Party Newspaper activities, Sun Yat-sen made a deep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function, management and strategies of the Party newspaper and established his initial thought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Newspapers with the core of “Revolutionary Party is the body, while Party Newspaper is the tool”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ed lots of flaw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of Revolutionary Party under Sun’s leadership, which greatly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Newspapers.

Key words: principl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Newspapers;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Bourgeois party view

孙中山的党报思想发端发展在辛亥革命期间,成长成熟于民国成立后的进一步革命斗争中,两者一脉相承,紧密相连。但是从孙中山对党报组织原则、管理方式、宣传策略和地位作用的思考论述及其领导实践来看,其在辛亥时期和民国初期又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然可分为两个阶段。而目前学界在论述孙中山党报思想时,主要集中在其民国成立以后至北伐之前的党报观念和实践,^{[1]72}而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针对党报的有关谈话、通信、报刊文章等相关材料则不甚注意,或研究不深。^{[2]150}较

为系统地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究其渊源,详其端绪,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孙中山党报思想的发生脉络、发展动因和演变轨迹,深刻地认识孙中山党报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拟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做一扼要述评。

19 世纪末,孙中山发起兴中会之初,恰值维新思潮勃兴之际,革命思想既鲜为人知,又乏人认同。

当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兴中会者,仅数百人而已。并且其三分之二为远离故国,漂泊海外,艰辛谋生的华工和华商,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此外,兴中会组织松散,会员联系极少。^{[3]456}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设兴中会的四大任务之首就是开设报馆,以通风气。“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4]22}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创办之后四五年中内唯一一篇论述到党报的文章。这代表着孙中山党报思想的萌芽,除提出组织革命党,就要创设报刊,以求开通风气之外,尚无其他具体内容。孙中山此时的党报思想不仅和康梁维新派的党报思想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和一般商业报刊思想也没有实质差异。这是因为革命党势力弱小、财力窘迫、影响甚微,特别是因“文人墨士极感缺乏”,^{[5]10}其尚无力创办一份机关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兴中会都还缺乏实际运作党报的实践和经验。

二

1900年,孙中山命陈少白在香港创办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方为第一张革命党报刊。此后,伴随革命力量的日渐壮大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留学生逐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并在海内外掀起创办革命报刊的热潮,^{[6]56}孙中山在指导革命报刊的建设和宣传活动中,以及在总结革命报刊建设和宣传活动的得失成败中,他的党报思想逐步形成,日渐成熟。孙中山对党报的指导工作主要是通过和广大革命同志的频繁通信和讲话晤谈,以及少量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此,他的党报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些书信、讲话和报刊文章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党务、军务和报务的高度一体化

为集中革命党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孙中山指出既要党报建设成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同时又要将其建设成为联络和指导革命工作的机关。这是孙中山从创办第一份党报《中国日报》起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他每创办或指导创办一份党报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都将报馆建设为负责当地党务、

军务的革命机关。如1909年,他在指导同盟会巴黎通讯处创建党报时,就明确指出“此报将来可作交通内地各省有心人之机关,又可作联络欧洲学界之枢纽。”^{[4]416}1910年,孙中山将这种思想精辟地概括为政党为体,党报为用。体用之说在清末流行一时,体用本身的意义也是人言人殊。^{[7]95}孙中山这里所说的“体”是机体,“用”是功用。他在与旧金山美西同盟会机关报《美洲少年》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革命党机关是实现革命党宗旨,发挥革命效力的根本;而革命宗旨的充分发扬,革命效力的全部发挥端赖于革命报刊的大力宣扬。“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4]439}他认为创办革命报刊和革命机关建设“两件事就是一件事。”^{[4]439}

政党须注重党报建设,以借助党报光大党义,扩张党势,这是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党报思想的继承。当时西方党报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党报纸不隶属于政党,但出于对该党理念的认同自愿支持和宣传该党思想;二是报纸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诉求,自主创办一个政党;三是政党出资创办,津贴支持,直接组织领导的党报。与西方当时通行的党报组织形态和运作观念不同,孙中山提出政党为体,党报为用,将党与党报上升到体用合一的密切关系,则是他在总结中国革命党党建和党报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创造。虽然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新型党报已经在俄国出现,但当时俄国共产党党报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孙中山对它还不了解。

(二)党报具有强大的革命宣传效应和广泛的革命动员效力

孙中山之所以重视党报的建设和宣传活动,将党与党报上升到体用合一的紧密关系,就是因为他认为党报具有强大的革命宣传效应,能够达到广泛的革命动员效力。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力单势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时无法撼动清廷统治。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沉溺在忠君爱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之中,根本缺乏革命思想,“人心几死,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4]387}在这种局势之下,革命宣传工作尤为重要。党报确为革命党

之“体”发挥其“用”的必要条件和必备手段。1905年,聚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精锐的办报力量”创办《民报》时,孙中山对其给予厚望。这集中体现在他为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在教育启迪群众革命思想活动中,报刊是最适当,最有力的工具。“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而群众获悉革命思想,养成革命意识,则又是展开革命行动的前提。“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因此,他称报刊是“舆论之母”。^{[4]288}他希望《民报》能够担此重任,发挥这样的力量。

即使在革命经费最紧张,革命活动最困难之时,“吾党财政之困难,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4]367}孙中山依然紧抓党报建设宣传工作毫不松懈。“今日海外同志的工作要点应该着眼在此处,务必做到宣传与筹款同时并重。”^{[4]438}也正是因为,他认为党报的革命宣传直接关系到革命党的命运和革命活动的前途。当主持《民报》的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孙中山再也无法有效地领导《民报》时,他全力投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中兴日报》的建设中,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兴报》……此于南洋吾党前途关系至大,不待赘言,望我兄提倡,与各同志竭力。”^{[4]410}

(三)党报应根据革命局势和环境灵活调整宣传策略

体贵一,用贵活。党的革命目标要明确而坚定,而党报的革命宣传则要灵活而不拘泥。因此,孙中山注重党报的宣传策略问题,他提出党报应根据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面对变化着的革命形势,针对不同层次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读者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二十世纪初,革命思潮日渐勃兴,清政府不仅严厉查封国内公开倡言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党报纸,同时对激烈宣扬革命思潮的海外革命党党报,也是严防死堵,禁其入境。鉴于这种情形,孙中山指出,在中国内地发行的革命报刊可以不必直接诉诸激烈的革命言论,可采取隐晦和曲折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如1909年,同盟会巴黎通讯处的同志计划创办一份发行到中国内地的党报,孙中山就此指出,这份报刊“其言论表面当主平和,以不触满政府之忌,而暗中曲折,引人入革命之

思想。”^{[4]416}他还要求报刊名称也可隐匿其革命色彩,名之为貌似学术刊物的《学报》。在谈到该报具体刊载内容时,孙中山指出,“可言科学、政理及欧洲时事(此门便可多引革命之事实)等等大端。”^{[4]416}这些内容从表面上看与中国革命无涉,但其则蕴含着反封建反专制的先进思想,这其实就间接起到宣传革命的效果。揆诸实际,孙中山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当时在国内公开出版的革命党党报,绝大多数都是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还提出在报刊发行方面也要讲究策略。如为了使前文所说的《学报》,便利地输入内地,孙中山建议革命党党员去游说清廷驻外公使,设法招募他们入股报刊。这样有清廷高级官员为报纸做掩护,其在内地发售即可通行无碍。“吾党各同志可各就其地运动清公使助资;公使肯出资,将来必肯代为介绍行销内地,如此销场一广,则运展可灵。”^{[4]416}

而在社会形势已经转变为对革命有利时,党报应当“大张旗鼓尽力宣传”。1910年,孙中山看到革命态势的发展日新月异,“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年”时,他指出党报要“大张旗鼓尽力宣传”,这才能及时跟上革命形势,从而推动革命风潮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他建议“最好还是把《美洲少年》改组成为一间每日出版的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4]439}随后不久,《美洲少年》改组为日刊,定名为《少年中国晨报》,在美洲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4]439}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报刊应针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调整其刊载内容的思想水平和难易程度。他与《美洲少年》的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美洲少年》适合知识丰富、思想活跃的青少年阅读,而对一般读者来说则显得思想复杂,内容不够普及。“《美洲少年》是适合有思想的少年阅读的,但对于一般华侨而论,好象还有一些不够普遍。”^{[8]578}

(四)党报要注重资金募集和出版发行工作

无论是立“体”还是致“用”,即无论是建党,还是办报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孙中山清楚办好党报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他多次体会过党报因资金匮乏致使报务窘迫的局面。如1908年,当《中兴日报》遭遇财务危机时,他曾致

信邓泽如说:“因今年资本不足,屡次临渴掘井,故报务甚为支绌;非得资本较充,不能从事改良进步。”^{[4]401}他甚至痛苦地经历过《民报》因资金入不敷出,最终导致主持报务的同志发生分裂的悲剧。因此他非常重视党报的资金募集工作。当时革命党党报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形式:一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二由本党资本家党员出资赞助,三是本党党员集资入股。凭借第一种情况筹款实属不易。而依靠第二种形式,党报的宣传内容针和管理运营又往往会受到个人牵制和制约。只有采用第三形式,由全党出资办报,党报的人、财、物完全隶属于党组织,党报是党下属的宣传机构,这才能将党报真正建设为与革命党体用合一的党报。因此,孙中山特别赞成第三种形式。1909年为“维持扩充《中兴报》计”,孙中山致信新加坡的革命同志要积极入股《中兴日报》,并特派罗节单前去劝招入股。1910年,当《美洲少年》周刊因试图改组为日报出版,而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时,孙中山也向该报负责同志指出要号召党员筹措经费,“你们不要以为办日报资金难筹,其实会员众多,自然容易,向这一条路子想想是通的。”^{[4]439}除积极为党报筹措资金外,他也关注如何扩大党报发行销售的工作。1905年9月,在《民报》即将创刊前,他就致信新加坡的革命同志,要求他们代为经理销售《民报》。“弟现与同志在东京创办一杂志,名曰《民报》,不日可以出版,自当请足下为星洲之总理也”^{[4]286}他在面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时,也会借机推广革命报刊。1906年,他在马来西亚塞伦班与当地华侨谈话,在驳斥康梁改良派宣扬的中国进行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的观点时,就不失时机地推销《民报》。他说:“《民报》精卫有论说《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可购一份《民报》便知道其道理也。”^{[4]294}

(五)优秀的革命报人在党报兴衰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在思考如何办好党报中,孙中山固然重视报刊要拥有充足的经费,但他更为看重优秀革命报人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认识到优秀革命报人在党报组织宣传活动中的关键作用,他始终注意为党报推荐和罗致此类专才。郑贯公加盟《中国日报》,冯自由担任《大同日报》驻日本记者,卢信主持《檀山

新报》笔政,等等,都得力于孙中山的举荐。为了能给党报招募到得力的主笔,他往往不惜不遗余力地积极奔走,殷勤劝说。如为劝说吴稚晖加盟《美洲少年》,孙中山致信吴氏,真挚恳劝:“若得先生之笔以发挥之,必可一华侨之志也。此事关系于中国前途甚大,弟切望先生为大局一来美洲,千万勿却。”^{[4]510}

(六)党报要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劲有力的战斗性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摆脱了清廷查禁迫害,能够在海外自由出版的革命派党报。当时,海外革命党党报的主要对手和最大竞争来自保皇党党报。它们进行的保皇立宪宣传,既干扰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又诱使海外侨民抛弃革命,支持立宪。为此,孙中山指出革命党党报要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吾人革命,不说保皇”,“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4]232}

党报的战斗性则表现为,革命党党报与保皇派报纸的激烈论战。孙中山身先士卒首先拉开论战序幕。1903年12月和1904年1月,他在《檀山新报》上发表著名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批判康梁宣扬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保皇即革命等观点。此外,他要求革命同志“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4]230}此后,在孙中山的指挥和参与下,两派在海外论战的进一步扩大。1908年,他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抨击保皇党机关报《总汇报》鼓吹的保皇立宪主张。他有时还口授要点,提供论据,让别人执笔,写成专文去参战。胡汉民和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的很多出色论文就是“时时受到孙中山指导而写成的。”^{[9]421}

三

当时的革命环境、党报实践,以及孙中山本人的独特思考和认识,使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主要对海外革命党党报经验教训的总结

孙中山对在香港和海外出版发行的革命党党报的组织宣传工作指导较多,而对在中国内地刊行的革命党党报的实践活动的直接指导则很少。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遭清政府严密通缉后,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他都无法踏入国门,一直流亡在海外进行革命工作。同时受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更主要是因为同盟会本身组织松散,联系疏阔,除同国内边境地区的革命党和党报有所联系外,他同内陆腹地的革命党和党报则鲜有联系,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直接的领导和指挥。从孙中山现存的文集和当时革命党人的回忆文章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没有直接对中国内地革命党党报活动做出过具体的指示和教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主要是对海外革命党党报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在国内主持党报的同志,很多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同盟会会员,他们中很多人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的接触和频繁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同孙中山思想,作为孙中山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党报思想对他们的党报活动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精英主义的党报观

一则深受中国传统英雄主义思想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则基于对当时中国民众普遍愚昧无知,自由民主思想极度匮乏的现实认识,^{[10]30}孙中山一贯秉持一种精英主义的革命观和党报观。在革命活动中,他呼吁作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挺身而出领导革命运动。“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4]192}在党报的革命宣传中同样,他倡导并力行,作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分子——革命党担负起向民众传播自由民主思潮的“天职”,以启发和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民主而革命。如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心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4]289}

(三)党务军务报务的高度集中化,有时对报务造成不必要的妨碍和影响

孙中山指出党建和办报“两件事就是一件事”。党务、军务、报务一体化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党报宣传和革命活动中

来,但是党务、军务、报务的高度集中化也会对报务造成不必要的妨碍和影响。在革命活动中有时单纯是军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到报务。当《中兴日报》销路日广,影响日大的时候,因国内起义失败而流亡新加坡的革命同志视报馆为机关,都来投靠,寄寓报馆,衣食住行,所有费用全靠报馆开销,结果导致报馆的主要资助人张永福不堪重负,报刊也几乎无法维持。^{[4]254}《中国日报》也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恰巧当时香港富商李纪堂加入同盟会,捐资襄助,方使《中国日报》度过危机得以继续出版。^{[11]67}

(四)无组织,无系统的党报宣传,削弱了宣传效果

虽然,同盟会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方式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式,^[12]但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同盟会都是松散的革命联盟,它们既缺乏固定的组织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缺乏行动上的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13]120}政党之“体”尚未健全,党报之“用”自然也难以最大化地发挥其效力。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既未设立过统一管辖党报活动的组织机构,也未发布过具体指导党报工作的文件命令。孙中山对党报的领导一般都是依靠私人情意,以商量的口吻,通过通信交流和讲话晤谈的方式进行。如《民报》经费短缺问题,导致党内同志不和,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时。孙中山为此八次致信在巴黎的吴稚晖,希望他能在他主持的同盟会系党报《新世纪》上著文辟谣,讲明事实真相。对于党激烈矛盾这样严重的问题,孙中山也是以协商的语气致函吴稚晖,客气地说“请先生费神为之”,^{[4]425}“可否再下公评于《新世纪》,一听高见裁之。”^{[4]425}就像同盟会会员对同盟会的忠诚一样,党报对党的服从完全依靠他们对共同的革命目标、理论、纲领、策略的信仰与追求。遗憾的是,除了推翻清廷统治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外,革命党团体在革命理论、建国纲领和斗争策略上从未取得过一致。这造成各党报之间派系林立,成见深重,不仅宣传步调不协,口径不一,而且还为互争雄长,相互诋毁。1905年同属同盟会系的《中国日报》和《有所谓报》因为抵制美约意见不和,互

相攻击。^{[14]173}甚至有些党报内部因意见分歧严重,各持己见,导致组织分裂。更有甚者,在脱离党报之后,倒戈相向。^{[14]59-66}党报内部、党报之间矛盾重重,冲突频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党党报作为一个整体的宣传力量,特别是严重地制约了党报统一、完整地宣传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思想。

对于一个正在为推翻清廷专制统治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党来说,党报之间缺乏统一的部署和行动,党报内部缺乏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党报同志又无共同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革命党党报的重大缺陷。可能孙中山当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种缺陷,只是由于革命党实力太弱小,革命工作又千头万绪,他无力纠正和改变这种状况。

后来当民国成立,他对辛亥革命时期党报宣传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故收效仍小,故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4]436}并且鉴于民国成而不立,帝制推而不翻,新的革命局势的斗争需要,特别是在借鉴和学习俄国苏维埃革命成功经验之后,孙中山的党建和党报思想走向成熟,他提出了新的党报工作方针,并领导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报建设的措施。这不仅表明孙中山将党报为主体的宣传工作提到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党报思想体系最终的形成和确立。

参考文献:

- [1] 童兵,林涵.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2] 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
- [3] 费正清,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4] 孙中山. 香港兴中会章程[M]//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刘建清. 中国国民党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7] 孙中山. 致王子匡函(一九零九年十月八日)[M]//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9] 陈孟坚. 《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M]. 台北:中正书局,1986.
- [10] 黄旦. “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潮主潮论[M]. 复旦大学图书馆,1998.
- [11] 寺广映雄. 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J]. 中州学刊,1996(2).
- [12] 邱钱牧. 中国政党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3] 高良佐. 孙中山先生传[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 [14] 崔之清. 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珂